

何格恩著

唐
代
的
韶
州

（本文載民族雜誌第三卷第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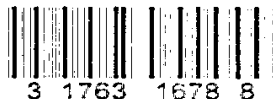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

MG

k296.5

4



3 1763 1678 8

唐代的韶州

一 緒言

廣東自秦漢以來，已經隸屬中國的版圖了。可是唐以前中國的政治中心都在西北，廣東是南荒邊徼的地方，自然無暇去開闢。所以廣東在唐以前沒有文化可言；所產生的人物也寥若晨星。然而到了初唐的時候，一般人還認為「蠻鄉瘴域」的廣東，忽然產生了兩個空前偉大的人物：一個是首創南宗的慧能六祖（註一），一個是開元名相張九齡（註二）。這種偶然的現象却包含着很重要的意義：就是中國文化的南移。

慧能生於貞觀十二年（公元六三八）（註三），張九齡生於儀鳳三年（公元六七八）（註四）。九齡是曲江的土著（註五），慧能的籍貫雖然是新州；可是他自儀鳳元年（公元六七六）在廣州法性寺薙髮以後，次年便至曹溪，直至先天

唐代的韶州

二年（公元七一三）卒時為止，共住了三十七年，也可算是曲江人了。在這四十年當中，曲江一縣裏，竟能產生兩個偉大的人物，豈不是一樁奇怪的事情嗎？

二 廣東的人物何以到唐代而始盛

說到這裏，讀者自然會發生一個疑問，就是：『爲什麼廣東的人物到了唐代而始盛？』這個當然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問題，我對於這問題沒有深刻的研究，不能多說；祇好把由漢至唐的歷史背景大概考察一下，分析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原因來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吧了。

I 政治的原因：大概可分爲兩點說：

A 避難：邱濬瓊臺會稿（卷三）廣東府志書序說：『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於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廣東通志（卷



九十二)也說：『自漢末建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遺韻，衣冠氣質，薰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自從東晉南渡，中原已淪為異域，中間經過五胡十六國的擾亂，北方的望族，多逃避到江南去，這可算是中國文化南移的開始。在南北朝的時候，南方的政局也不很安定，常有變故；嶺南雖然是蠻貊之鄉，可是離當時的政治中心稍遠，似乎可以苟且偷安。有些人不憚跋涉之勞，跑到嶺外避難去的，也有不少。例如薛綜（註六）葛洪（註七）江總（註八）蕭引（註九）章華（註一〇）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這許多文士學士先後南來，對於廣東文化的開發，當然有不少的影響了。

B 流貶：自漢以來，朝中達官貴人，犯了法或得罪了皇帝，往往有免死配流嶺南者。據廣東通志（卷二六五）職官錄（四）所載：漢代有張由等十七人，三國有虞翻等十人，晉有孫泰王誕二人，宋有孟徽等十三人，齊有謝超宗等三人，梁有范縝等四人，陳有裴寬一人，隋有房恭懿等八人。其中如三國時的虞翻（註一一），宋時的謝靈運（註一二），隋時的薛道衡（註一三）等都是很有名望的人。然而唐以

前得罪至嶺南者，多是免為庶人，對於地方的教化，影響尚少。至唐時始有謫為宦者，有「責授」「左授」之分，「長流」「配流」之目。所以廣東通志裏面所載唐代的謫宦特別多。其中十之八九是政治犯，本來很有思想和學問的人，一旦遭遇政變，便大批的被放逐（註一四），尤以則天革命及神龍復辟間為最甚。我曾經根據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廣東通志，全唐詩，全唐文等書編成一個唐初文人流放嶺南一覽表，由武德元年（六一八）至開元元年（七一二）中間有姓名可考者大約一百五十餘人。其中如崔仁師，羅道琮，劉納言，董思恭，徐齊諱，郭正一，元萬頃，張說，魏元忠，房融，王無兢，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盧藏用，李邕，薛季昶，劉幽求等都是博學工文之士，『文獻流傳於南荒，詞章散播於嶺表。』這和廣東文化的展拓有極大的關係了。

II 經濟的原因：大概可分兩點說：

A 物產：大抵嶺南所出產的金銀、珠璣、玳瑁、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香藥、鸚鵡、翡翠、孔雀等珍奇寶貴的東西，自漢以來，已為中原人士所注意（註十五）。晉書

吳隱之傳說：『廣州包山帶海，珍異所出。一饌之資，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捕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齊書王琨傳也說：『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因為到嶺南去可以發財，當時甚至有些朝裏達官貴人，不怕瘴癘的苦，不辭跋涉的勞，自動請求南遷的。例如晉書溫嶠傳說：『溫放之驕子，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至於爲着經營商業而南來者更不消說了（註一七）。物產的珍奇自然和地方的富庶有關，而一地方經濟的發展，當足以促進該地方文化的向上。自漢以來，中原人士到嶺南去做官或經營的，既有增無已；其中也許有些留戀着而不忍歸去的。無形中把中原的文化移植到嶺南去，也是一件可能的事。

B市舶：中國和外國的海道通商，大抵漢時已開始了。漢書地理志說：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後漢書孟嘗傳也說：『郡（合浦）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據高桑駒吉支那文化史講話說：『桓帝時大秦王安敦即羅馬之Marcus Aure-

lius Antonino）帝遣使者由海路經印度洋至日南，齎象牙瑇瑁等貢獻於漢，求絹布及其他貨物，實在一六六年。然帝遣使支那的事實，不見於羅馬的史料；恐是當羅馬東領之一埃及或希臘的商人稱帝的使者而來。此後羅馬的船舶屢來，支那的商人亦至錫崙島附近，彼此往來，交易漸盛。』（註一七）吳晉之世，大秦國（即羅馬）的商船舶來往印度洋及支那海。至東晉之末及南朝之世佛教盛行，印度以東諸國交通亦開，與林邑、扶南、狼牙修、闍婆、師子國、印度等國通商；支那的海運漸起，閩廣的商船往來於此等諸國。（註一八）這些多半是根據外國人的記載，也有相當的可信。至於專紀廣州一地市舶的材料也有不少。例如廣東通志（卷二三）引梁書蕭勵傳說：『廣州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職毫不犯，歲十餘至。』又引梁書王僧孺傳說：『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唐代市舶的記載，尤不勝枚舉：例如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說：『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海舶以珍品與中國交市。』李肇國史補說：『南海舶：外

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有蕃長爲主。領市舶使（註一九）藉其各物。納船脚，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大抵那些珍奇寶貴的東西，廣東土產者少，從外國輸入者多。與地紀勝（卷八十九）引韓愈送鄭權序說：『外國之貨日至，珠香犀象玳瑁奇物溢於中國。』又引許得已南海廟達奚司空碑說：『番禺控引海外諸國，賈胡歲具大舶，齎奇貨，涉巨浸，以輸中國。』有了市舶通商而廣東的經濟愈發發展，同時在中國所占的地位，也日臻重要。曲江集（卷十一）開鑿大庾嶺路序說：『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滙之求。』在另一方面來看：有了市舶通商，海外的交通日臻便利，而天竺梵僧的來中國者也日多。例如晉太康二年的迦摩羅（註二〇）隆安中的曇摩耶舍（註二一）宋元嘉初的求那跋摩（註二二）元嘉十二年的求那跋陀羅（註二三）梁普通八年的菩提達摩（註二四）常定中的跋多羅三藏（註二五）天監元年的智藥禪師（註二六）等都是由海道來廣東。除了宣傳教義外，也有創建寺刹者；這對於嶺南佛

教思想的發展很有關係。而中國的和尚，也有由廣州附搭海舶到印度求法者，唐咸亨二年的義淨（註二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外來思想的輸入，常足以促進文化的發展。禪宗的崛起，就是佛教思想的一大革命，而廣東就是這革命的策源地。市舶通商直接間接所發生的影響又可想見了。有了上列幾個政治和經濟的原因，由漢至唐初，經過八百年的醞釀，許多無名英雄的努力，一面把中原的文化帶到嶺南去，一面把海外的思想輸入嶺南來。『貫通融匯，蔚爲大觀。』所以唐初廣東能夠產出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也是自然的結果，而不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情了。

三 唐代廣東的人物何以韶州爲最盛

唐代廣東的人物，以宗教思想而論，慧能自然是空前絕後的第一人。以科第及政治上的地位而論：在張九齡之前，有欽州的寧原悌（註二八）在張九齡之後，有日南的姜公輔（註二九）桂陽的劉瞻（註三〇）封州開建的莫宣卿（註三一）番禺的鄭愚（註三二）在當時亦頗負盛名；可是文章功業遠不及張九齡的能流芳百世，照耀千古。而且曲江張氏除了九齡以

外，他的伯父宏雅，顯慶四年舉明經中首及第（註三三），胞弟九罕官至殿中監（註三四），九章官至南海太守嶺南經略使（註三五）姪孫仲方官至秘書監贈禮部尚書（註三六）。一門皆顯若，可算嶺南唯一的望族，沒有能夠和它比擬的。

說到這裏，讀者自然會發生第二個疑問：『爲什麼唐代廣東的人物以韶州爲最盛？』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沒有十分的把握；如果讀者容許我妄猜的話，至少可以舉出下列三個原因來作個簡單的解釋：

I. 氣候：吳書陸凱傳說：『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沙、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嶺南的風風露雨，潮溼瘴氣，的確足以令北方人士畏懼和討厭，所以每讀唐人流貶嶺南所作的詩，沒有不說瘴癘的可怕的。韶州雖在嶺南，然距廣州五百餘里（註三七）。『無嶺北之嚴寒，和分風露；無海南之恆燠，涼兼冰雪』（註三八）。譚太博清淑堂詩說：『地有九疑清淑氣，人無五嶺鬱蒸愁。』（註三九）這兩句話，可以表見韶州氣候的適宜了。所以漢代曲江熱桂陽郡，統於荊州（註四〇），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大抵古代中原人士的南遷嶺外者，以天氣關係，多半

喜歡在韶州附近卜居，而很少跑到廣州以南的。所以廣州府屬的顯宦望族，如梁霍方何黃陳李容諸姓的家譜，多說是南宋咸淳間始由南雄珠璣巷南遷，很少說唐以前即住在廣州府屬的。即以曲江張氏而論，其先亦爲北方人；唐初以因官樂土，家於曲江（註四一）。及至九齡貴顯，而『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註四二）可見韶州的氣候，比較適宜於北方人，所以纔有留戀而不忍去的，大抵東晉六朝以來，衣族望族留落韶州者，必定不少，所以能得『將相之鄉』的稱號。（註四三）唐皇甫湜詔陽樓記說：『嶺南屬州以百數，而韶州爲大。』（註四四）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郡，必有忠信。唐代韶爲大郡，地廣人衆；自然能產生出類拔萃的人材，也是理所當然的。

II. 治安：廣東自古爲邊徼的地方，中央威力之所不及；常有蠻僚的變亂（註四五）。而漢魏以來官廣州者，又多以貪墨，坐激吏民之叛，啓蠻獠之寇（註四六）。北方人士的南遷者，自然不願深入內地與蠻獠雜處。韶州的富庶不及廣州，官斯土者，沒有奇香異寶的引誘，貪污之風也許不如廣州之甚。而蠻獠的變亂，自然不如廣州的頻繁。且地當

衙要，常宿重兵。六朝以來，始與內史，多委功商望重的人（註四七）。以治安而論，韶州似勝於廣州。故衣冠望族，多聚居於此。宋王韶之始興記說：『靈鷲山：臺殿宏麗，面象巧妙，嶺南佛寺，此為最也。』由寺刹的宏麗，可想見六朝時候始興的繁華了。

II. 交通：郭蒼周府君功勳碑銘說：『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註四八）方輿紀要又說：『府唇齒江湖，咽喉交廣，據五嶺之口，當百粵之衝。晉末徐道覆以始興之衆，踰嶺而北，幾覆建康；陳霸先當蕭梁之季，倡義始興，卒平侯景。唐皇甫湜曰：「嶺南屬州，詔為最大。蠻越有事提兵踰嶺，詔為必爭之險也。」』（註四九）自漢至唐，韶州為南北交通的樞紐。在平時為商旅所必經之路，在戰時為軍事所必爭之地，其重要可想見了。交通既發達，四方的來往者日多，人民的智識自然開通，地方的文化自然進步。『且韶之景，富於山水，而佛剎名勝，相望於野。』（註五〇）文人學士，從北方到嶺南的，道過韶州，多有吟詠（註五一）。而天竺梵僧，從南海踰嶺北行者，亦多在此流連（註五二）。所以曹溪的頓旨，卒成禪宗的正統；曲江的詩文

亦馳名於天下。環境的影響是不能否認的。

以上所舉三個原因，却有輕重的分別，未可等量齊觀。地方的氣候和治安雖然足以影響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發展；可不是最重要的條件。因為人類是適應環境的動物，北方人士初到嶺南，對於廣州以南的潮濕瘴癘在短時間內當然受不了；經過相當的時期，便習慣成自然了。所以唐代以後，南遷的人們對於瘴癘的恐怕，不如唐代以前的利害了。而且『風俗與化移易』，唐以前，重內輕外，任官嶺南者，多昏庸貪污，如孟官吳隱之的廉潔，殆不多見，所以談不到緩撫教化。唐代任官廣州者如王方慶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等，均有政績可稱。（註五三）教化日廣，風俗日淳，從前的所謂蠻獠，也安居樂業，與漢族同化了（註五四）。所以唐宋以後，廣州衣冠禮樂之盛，無異於中原內地。氣候既能適應，治安也不成問題，則唐以後韶州在嶺南州羣中所占的優勢已不復存在；到了北宋，韶州所能保持的特點，就是南北交通的樞紐罷了。然而韶州所產生的人物，依然是嶺南各州郡的巨擘（註五五）。由此可見交通的影響於文化，的確比其他的條件大得多，而更有詳細敘述的必

要了。

四 韶州的交通

說到韶州的交通，可分三點來說：

一、唐以前的交通：嶺南和中原的交通，大概始於秦始皇的時候。據史記的記載，秦有五嶺之成（註五六）。按杜佑通典（卷二八四）的解釋：『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臨嶺是；都歷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吐瀘嶺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又按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一）的解釋：『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顧建之江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臨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兩說稍有異同，大抵都是後人的揣測，沒有史籍的根據。南越叢錄（卷二）說：『滄溪陽山涯口皆有秦關，名曰三關；清遠隘口亦有之。靈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之所置之關，皆在連州之境。

，而趙陀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絕新道，於仁化北一百三十里，築城以壯橫浦；於樂昌西南二里，上抵瀘口，築城以壯滄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柳州。當時東嶺未開，入粵者多由此二道。即使安南有守，而兵間道從郴桂直趨，可以逕薄韶陽，橫斷南北，此陀設險之意也。』大抵漢以前入粵的道路，都在韶州的西北。漢書武帝紀說：『元鼎五年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宋余靖湟水館記說：『出豫章下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又據韶州府志（卷一）說：『湟水即武水』。大抵大庾樂昌入嶺的東西兩要道，在漢武帝平南越時已經開始了。可是兩漢的政治中心都在西北，對於樂昌一路，自然銳意經營；如後漢光武建武年間，桂陽郡太守衛轅的一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註五七）章帝建初末，大司農鄭宏又奏開零陵桂陽諸道（註五八）。靈帝熹平三年桂陽郡守周憬又鑿滄開峽（註五九）。大庾一路，似乎沒有什麼注意。大抵當時南海交趾的進貢（註六〇），都是取道桂陽；而建武十八年馬援南征交趾，也曾經渡昌樂瀘，且有武溪深詞的流傳（註六

一。可見在兩漢的時候，樂昌一路比較重要。自東晉南渡以後，南朝的政治中心，都在建業，則大庾一路較為便捷。晉末盧循的叛亂，徐道覆率領始興的人馬，逾嶺而北，幾覆建業。（註六二），蕭梁的時候，陳霸先倡義始興，逾嶺而北，卒平侯景之亂（註六三）。大抵東晉南北朝的時候，大庾為交通的孔道，而樂昌一道反為不很重要了。

II. 唐代的交通：唐代的政治中心在西北，來往嶺南的路線，自然沿南漢之舊，經衡湘而下，冒樂瀘（註六四）。然而陸路崎嶇，車馬勞頓，總不如舟楫的舒適。自隋煬帝開鑿運河以後，開洛與江淮的交通已經十分便利。由江淮而赴嶺南，也可以循嶺南朝的舊道。所以開元四年張九齡曾經獻狀開鑿大庾嶺路（註六五）。自此以後，大庾一路更為平坦。終唐之世，樂昌大庾兩路，並行而不廢。現在把這兩路線簡單說一說：其由西京動身者，自藍田山入商洛（註六六）過浙陽，臨漢水，至襄陽，由荊州過洞庭湖至岳州，沿湘水，經潭州至衡陽，由郴州踰騎田嶺而入昌樂瀘：這是第一路線（註六七）；或由西京至洛陽，循洛水至汴州，沿漕運的路線至揚州，過江即為潤州。或溯江而上，經宣州的當

塗而至江州，渡鄱陽湖而至洪州（註六八）。或由潤州經常州，蘇州，杭州而至衢州，折而西行，由信州而至洪州（註六九），沿章江而下，經吉州虔州，踰大庾嶺而入韶：這是第二路線（註七〇）。唐代流貶嶺南，有無明文規定的路線尚屬疑問。如神龍元年宋之問貶瀘州參軍，則取道大庾（註七一）；同時沈佺期貶驩州，杜審言貶峯州，則取道樂昌（註七二）；長慶四年李紳貶端州（註七三），元和十四年韓愈貶潮州，則取道衡湘（註七四）；而大中初李德裕貶潮州則經江淮（註七五）。據元和郡縣志（卷三十四），韶州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三千六百八十五里，取虔州吉州路四千六百八十里（註七六）。唐代流貶官員，例必馳驛發遣，限期到達，不許延誤（註七七）。則二路之中自必取其較近者。試翻全唐詩，尤其是中晚唐時候流貶嶺南人士所作的詩，或送人到嶺南的詩，多說到衡湘或瀘水（註七八）而絕少說到大庾的。大抵由樂昌入韶仍為主要的路線，若宋之間的過大庾，李德裕的經江淮，似乎是例外（註七九）。至於自動到嶺南宦遊者，當然沒有時間的拘束，與流貶官員不同。其所取的路線，隨各人的自由，未可以一概論（註八〇）。大抵唐代來往嶺南

，除了到桂州者，出零武下澧水不經韶州外，凡往廣東及交趾者，無論取道樂昌或大庾，都經韶州。這的確是南北交通的樞紐，所以被稱為嶺南繁劇的大郡啊。

III. 唐以後的交通：北宋建都汴京，政治的中心在中原。江淮的交通有隋唐漕運的舊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其來往嶺南的路線，自然以走水道經江西入大庾為最便利，所以余靖演水館記說：『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武下澧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澧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之官，南自京都沿汴絕澧，由堰道入漕渠，汴大江，度梅嶺，下澧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九十里為馬上之役；餘皆需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故之嶺南雖三道，下澧水者十七八焉。』韶州新修京樓記又說：『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為邊邑，在越為交衝。治城居武水東澧水西，境壓騎田大庾二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而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於等夷，閩人最賢。漢唐之西都也，繇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澧水最便。騎田雖乘驛舊途，而王官往來大半水道。是以風亭

水館，高臺上舍，徒在澧水，不視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註八二)大庾路線日益發達，樂昌路線日漸荒涼，這是南北交通的大變化。然而韶州仍不失為嶺南的劇郡。南宋建都臨安，政治的中心在東南，其來往兩廣的路線，可經臨建而入潮循。而且廣州泉州明州杭州都設了市舶司(註八三)，東南沿海，商船往來，絡繹不絕。韶州在交通上所占的地位不比從前的重要了。元明清三朝都是建都燕京，政治的中心在東北。來往嶺南，如果走陸路的話，大庾依然是必經之路(註八三)。這是人所共知的，不消細說了。鴉片戰爭以後，海禁大開。外國堅固快捷的郵船，來往津滬港粵及東南沿海各大商埠。南北的交通，大家都喜歡取海道。大庾嶺一路遂成為歷史上的陳迹。近日國民政府努力於交通的建設，粵漢鐵路在最近的兩三年內便可全線完成。去年韶樂一段已開始通車，湖南株州一段也正在進行中。在最近的將來，韶州在國內交通上所占的位置，能否復興，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我沒有先見之明，未敢妄測，讓將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吧！

統觀古今：由漢至隋是廣東文化的醞釀時期，韶州所

產生的人物自然沒有什麼可說(註八四)。由唐至北宋是廣東文化開始發展的時期，韶州的人物最盛(註八五)。南宋以後，廣東的文化蒸蒸日上，盛於前代，(註八六)而韶州的人物反日漸式微(註八七)。由此看來：一地方人物的盛衰，時常和它在交通上所佔的位置成正比例，這是治文化史者所應該注意的。

五 結論

中國文化的南移，已經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可是一般人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來，中國文化史一類的著作，已寥若晨星；而在近人編撰的文化史裏面，能夠拿着窮源竟委的態度去研究這問題的更可能說是沒有。從來研究中國文化史的人，對於中國南北交通的變遷沿革前因後果，很少注意到。所以我雖然是一個門外漢，也不揣鄙陋把近日讀書所得的一知半解提出來，以備諸教於文化史的專家。寫這篇文的動機，不外「拋磚引玉」而已。

民國廿四年五月廿一日於清華大學。

〔註一〕胡適自撰文學史第十二章說：『這個南宗運動起於七世紀晚年，到八世紀晚年，竟大占勝利，代替北宗成為正統。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最近謝扶雅先生說：

『華南六祖慧能正好比西洋中世的南歐意大利的一位宗教思想革命家蒲魯諾 (Giordano Bruno)，在嶺南學報 (四卷一期) 光孝寺與方祖慧能一文裏，有很透闢的議論。』

〔註二〕楊萬里張余二公合詞記說：『人物學理，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邱濬遺集會稿 (卷二十二) 寄題張丞相祠 (第一首) 說：『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邇無倫。江南入相從公始，袞袞諸賢繼後塵。』同書 (卷三) 張文獻公曲江集又說：

『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

〔註三〕據法寶壇經起外紀。

〔註四〕據徐浩文獻公碑。嶺南學報 (四卷一期) 拙作曲江年譜另有詳細的考證。

〔註五〕徐浩文獻公碑說：『曾祖譚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為土著姓。』

〔註六〕廣東通志 (卷二三) 引吳書薛綜傳說：『少依族人，避地交州。』

〔註七〕韶州人物傳 (卷二十三) 寫洪傳說：『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

士，乃參廣州刺史程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始還鄉里。

○1

〔註八〕廣州人物傳（卷二十三）江總傳說：「侯景廢建鄴，其舅蕭勃先歸廣州，又往侯景。及侯景平，復為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是范當嶺南積議。在南時有別實化侯景雲時，是時雲亦適居番禺云。」

〔註九〕廣州人物傳（卷二十三）蕭引傳云：「侯景之亂，引曰：『諸王力爭，應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宗親南奔嶺表。」

〔註一〇〕廣州人物傳（卷二十三）章華傳說：「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專精習業。」

〔註一一〕廣州人物傳（卷二十三）陳翻傳說：「梅福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即處釋放，而請學不倦，門徒數百人。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註一二〕廣州人物傳（卷二十三）謝靈運傳說：「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靈運工為詩，與族兄融，從弟琨相抗。每有作，手自寫之，皆兼獨絕。文帝稱為二寶。每一首至都下，士庶競相傳誦。……靈運與兵叛逃，遂有逆志，追討禽之。送廷尉，貶正斬刑，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有司又請依法收治，文帝留於廣州禁錮。……又有謝靈運者，靈運之族人也。……以罪徙廣州。其子曜好學能文章，善草隸，長五言詩，即所謂謝元暉者也。」

唐代的韶州

〔註一三〕廣東通志（卷二六五）引隋書本傳說：「薛道衡字元卿。除吏部侍郎，坐拍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嶺表。……有詔徵還。」曲江集（卷十一）薛道衡王司馬登薛公道遠墓序說：「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靈樹以崇者？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源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同書（卷三）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遠墓詩說：「嘗聞薛公淚，非直癡門琴。……道衡遠跡，悲涼見此心。府中因暇豫，江山幸招尋。人事已成古，風流獨至今。……清景暫登臨。無復甘棠在，空餘蔓草深。晴光送遠目，勝氣入幽襟。水去朝南海，春來換碧林。……道衡涕泗甲，碑想漢川沉：曾是陪遊日，徒為梁父吟。」由此可見九齡對於薛道衡的被放逐，深表同情了。

〔註一四〕通鑑（卷二〇二）唐紀十八：「咸亨二年六月：朝士崔融（賀蘭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衆。……同書卷二〇五）：「長壽二年二月或告嶺南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增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絕，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新唐書裴道先傳說：「補闕李秦授為武后謀曰：『嚴代武者劉，劉無疆始，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即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遣使者賜勅慰安流人，實合殺之。」此外，如神龍元年復辟，凡附易之兄弟者均配流嶺表；神龍二年武三思用事，五王及其同黨，皆被貶謫；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通鑑卷二

唐代的福州

○八 由此觀之，可見唐初流徙嶺南政治犯人數的衆多了。

〔註一五〕搜廣東通志（卷三三）引吳書附傳；及瓊臺會稿（卷十五）食泉對。

〔註一六〕輿地紀勝（卷八十九）引隋志揚州南海序說：「南海交趾各一都會。所居近海，多犀象珠璣，奇異珍珍；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漢書地理志也說：「粵地秦南海尉趙陀自立，傳國至武帝時，漢以爲郡。處近海，多犀象珠璣，鹽鐵果布之族，中國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註一七〕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再版的支那文化史講話（第三章）附漢及び三國時代の文化，第一三三頁外國との通商一節譯述大意。

〔註一八〕支那文化史講話（第四章）附晉及び南北朝時代の文化（第一八三頁）商業一節譯述。同書（第五章）唐時代の文化（第二六三頁）海路の交通及び貿易一節又說：「先是，後漢桓帝之世大秦始通中國。吳晉之際，日南交趾爲東西貿易之地。羅馬商船專有印度洋及支那海的航權。及隋晉室衰，中國亂，交易一時衰微，商船之往來，殆至杜絕。然至南北朝之際，南朝諸帝有崇佛教的結果，開印度以東佛教諸國的交通，中國的遊歷漸興，經閩梁，室利佛逝至師子國（錫蘭）的航路，遂歸於中國人的手裏。再經隋至唐之初世，國廣的商船更擴張其航路，或由師子國沿印度的西海岸入波斯灣，或沿亞拉比亞的海岸至於紅海亞丁的阿丁（Aden）故當時師子國爲世界商業的中心，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

波斯人、獺太人、エチオピア(Ethiopia)人等諸國民來集於此，從事貿易。」

〔註一九〕市舶司的設立大抵始於開元中。唐府元龜說：「開元中市舶使周慶立與波斯僧造奇巧以進，侍御史柳澤上書以諫，帝嘉納之。慶立由是免。」（全唐文卷二七七有柳澤諫造用奇器書）。與輿地紀勝（卷八十九）又說：「按唐代宗寶應元年有市舶使呂太一。」唐代市舶使有姓名可考者，大抵祇此二人。

〔註二〇〕廣東通志（卷三二八）列傳（六十一）。

〔註二一〕柳貽徵中國文化史上冊（五〇六頁）引自高僧傳。

〔註二二〕中國文化史（上冊五〇七頁）：廣東通志（卷三二八）引太平御覽。

〔註二三〕中國文化史（上冊五〇八頁）。

〔註二四〕廣東通志（卷三二八）引舊唐書（卷一九〇）方伎神秀傳。

〔註二五〕廣東通志（卷三二八）引馬嶽山志。

〔註二六〕廣東通志（卷三二八）引嶺南名勝記。

〔註二七〕廣東通志（卷三二八）義淨傳說：「義淨字文明，俗姓張氏，范陽人。年十五出家，咸亨二年至番禺，附海船，經二十五年，遊三十餘國，以武后證聖元年齋梵本經還河洛，勅住佛授寺。先天二年卒，年七十九。」支那文化史講話（二三四頁）也說：「次爲高宗時，又有義淨，於六十七年由海路赴印度，費二十五年，歷遊三十餘國，獲四百餘部經典。六九五五年還。譯成五十六部，別著

大府西邊求法高僧傳二卷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註二八〕鄭元振：廣州欽江人，永昌元年進士第九人（廣東通志卷六十六選舉表四）。睿宗朝官太子洗馬。先天元年由諫議大夫爲嶺南道宣慰使（全唐文卷二七八）。

〔註二九〕姜公輔：欽州人，大歷十三年進士，翰林學士（廣東通志卷六十六）。德宗時擢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舊唐書合鈔卷一八九姜公輔傳說：「愛州日南人」。新舊唐書本傳錄：「不知何許人」。

〔註三〇〕劉翬：桂陽人，大中元年進士第三人（廣東通志卷六十六）。四年登博學宏詞科（登科記考），咸通中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新舊唐書合鈔卷二三八劉翬傳說：「彭城人，徙桂陽。」

〔註三一〕莫宣卿：大中五年狀元（登科記考卷二十二）。戎興會（卷二十一）解題說：「唐士俗隱逸，南僊未若名，道侔伊呂後，開道有宣卿（南士唐以前未有中狀元者，有之始開道莫宣卿）。」「同書（卷三）武溪集序說：「予嘗登梧子厚：『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圖蜀，而人材不盛。』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豈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爲魁者。張公在開元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開道之莫宣卿，亦已居天下選矣。然則二

唐代的潮州

子之言，果可信乎？」

〔註三二〕鄭元振：番禺人，開成二年進士（廣東通志卷六十六）。咸通初爲桂管觀察使，遷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功授兵部侍郎，中和初出鎮南寧，以檢校功召拜尚書右僕射卒。

〔註三三〕韓登科（卷二），廣東通志（卷六十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註三四〕文苑英華（卷八九九）題詞：段中監張九皋碑。

〔註三五〕韓通鑑（卷二）五天寶五載；楚庭科珠錄（卷三）南海詩廟引李北海（包）記。

〔註三六〕張仲方：貞元六年進士（廣東通志卷六十六）文苑英華（卷九四五）有白居易撰：贈尚書左丞張公墓誌。

〔註三七〕元和郡縣志（卷三十四）說：「潮州南至廣州，水陸相兼，五百三十里。」

〔註三八〕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一三二五卷）潮州府部（卷一）。同書又說：「風馬之說，嶺北在八月，嶺南在三月，則地氣升降，不獨相逆，亦復相反。而潮郡之風，與南越俱同嶺北，則古風與潮者，豈亦有說耶？」

〔註三九〕輿地紀勝（卷九十九）廣南東路潮州。楊萬里：臨清堂記說：「西在廣嶺之南，其北則潮州也。離遠之謂：『中州清淑之氣，至柳而窮。』余則謂：『潮州清淑之氣，自龍而始。』故嶺南之山之蔚，潮郡最焉。」

〔註四〇〕輿地紀勝（卷九十九）：漢武帝平南粵，而曲江以縣歸桂陽郡，故

於韶州。縣分桂陽爲始興郡，仍屬韶州。晉武平侯，以始興郡屬廣州。可見晉以前中國政治中心雖在西北，然曲江已視同內地了；若南朝則屬於安社刺史，設府爲荒僻哩。

〔註四一〕文苑英華（卷八九九）陳中監張九齡碑。

〔註四二〕曲江縣志（卷八）文獻公碑。

〔註四三〕韶州府志（卷十三）李勣：司空侯安都廟匾。

〔註四四〕見文苑英華（卷八一〇）

〔註四五〕唐書陳頊傳說：「此州之人，譏義者寡，服其安樂，好爲亂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置國者五萬餘戶。」宋書南吳林邑傳說：「廣州諸山但種雜穀，前後廢爲空。」隋書高祖本紀：「廣州諸山但種雜穀，前後廢爲空。」隋書高祖本紀：「廣州諸山但種雜穀，前後廢爲空。」

一年曾以番禺會長王仲宣作反，一度自南海縣移廣州來理曲江，設廣州總官府於此。雖不久還治南海，舉此一事，也可見經濟的興旺了。

〔註四六〕唐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七）引山堂考索南廣論。通鑑（卷二〇三）光宅元年：「秋七月戊午廣州都督路元微爲楊南府所殺。」

其北變的原因就是從道南始，食得無厭。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唐書書志楊南府傳說：「……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穀貨爲懷美所患，由是數怨叛。」可見道南的瘠瘠多由貪官污吏造成。

〔註四七〕例如晉之王導，宋之蕭道成，梁之范雲，陳之陳先，陳之侯安都等。

〔註四八〕梁韶州府志卷十。

〔註四九〕見廣東通志（卷一百二十）四陵（韶州府）。

〔註五〇〕輿地紀勝（卷九十）韶州風俗形勝。引余靖遊大南山序。

〔註五一〕例如梁江總經始興與果寺題僧法師山房詩。初唐人如房融，張說，沈佺期，宋之問等的題詠更多，另有考證，恕不枚舉。

〔註五二〕例如求那跋摩元嘉初奉召入京，道經始興，停留歲許，於靈鷲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廣東通志卷三二八）。智惠律師梁天監元年主韶州，尋得曹溪勝地，開山立石（法寶璣經）。又開羅特寺羅鷲寺（曲江縣志卷十六）。所以慧能僧元年在廣州法性寺禪髮後，便歸曹溪寶林寺。大抵當時南華山已有了前人開創的基礎，而慧能不過把它大加擴充而已。

〔註五三〕見廣東通志（卷二三四）直隸錄（四）。

〔註五四〕唐代對嶺南經濟振興和感化的工作頗爲注重。例如新唐書（卷九十三）李靖傳說：「靖以南方未朝延遠，喪亂以來，不見恩德。若不導以禮樂，兼示兵威，無以變其風俗。遂率所部兵馬，發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皆親自存撫耆老，問其疾苦，遠近悅服。」初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說：「又管內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奉餽，未嘗鞫問。方慶乃禁止府僚，絕其來往；首領稱冤者悉鞫之，由是境內清肅。當時儒者以爲有歷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同書（卷一八五下）宋庭璣傳說：「時庭璣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

承前使人體其夷淳，莫有到者。度其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
綱目，於是安堵。」

（註五五）：嶺南的人物，張九齡以後，以北宋的余靖為最著：歐陽修（六
居士全集卷二）贈刑部尚書余靖公神道碑銘說：「曲江儔在嶺
表，自始與張文獻公有隙于唐為貴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
余氏待而，歷四世始有顯低，而曲江安寧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
。」楊萬里張余二公合祠記說：「人物思遠古不多見，見必奇傑
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公朝余張公繼之。……
蓋自唐武德放於今，五百有餘載，專處二人而止焉，則亦希矣！
」明邱濬瓊詩合稿（卷三）武溪集序說：「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
公宋余忠宣公，二公皆吾人也。」陳獻章鳳樓記說：「夫自開
闢通唐，自唐迄宋，不知其幾千萬年。吾儕於前，泰山北斗，曲
江公一人而已耳；吾儕於後，泰山北斗，公與菊坡二人而已耳
。」

（註五六）史記始皇本紀說：「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過亡人，贅婿買人，略
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遷戍。」史記正義說：「徐廣
曰：『五十萬人守五嶺。』」

（註五七）後漢書循吏傳。

（註五八）後漢書鄭玄傳。

（註五九）廣東通志（卷三）引魏釋周府君功勳銘。

（註六〇）三輔黃圖（卷三扶荔宮）說：「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
宮（宮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蒼筤百本，山薑十本，
甘蕉十二本，留求于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
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上木南北異宜，
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
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暴死
，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移矣。其實則荔枝耳。鄧傳者被竄
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
其實。」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興元元年：荊南南獻荔枝，
千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
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
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大概當時
南海每年進貢荔枝龍眼等土產，跋涉長途是一件很苦的事情，然
而由此也可見漢代南北交通的頻煩了。

（註六一）韶州府志（卷九流寓）：粵東金石略（卷五）韶州府（金石三）
蔣穎叔撰武溪深時碑，曲江縣志（卷八輿地書六）鄭斬書武溪深
時碑。

（註六二）晉書（卷一百）庾亮傳。

（註六三）陳書高祖紀。

（註六四）粵東金石略（卷五）蔣穎叔撰武溪深時碑自跋云：「……余讀退之
漁吏詩云：『南行賄六旬，始下昌黎潭。』獨疑『昌黎』昌黎之
名不同。遂移書口口（原四兩字）李君，答曰：『樂昌縣五里有昌
黎潭，即昌黎之昌黎也。』」

山，有樂石尤大。當是樂昌以縣名，昌樂以山名。這今在縣上五里，余乃釋然無疑矣。」按昌樂縣自東漢周景闡以後，唐代有沒有再加修理，未見記載。福州府志（卷三乳源縣）：小松岡在縣西北二十里，地名馬頭岡，晉得開元西京道路。又說：縣西由大雷橋上馬頭岡，即之西京路，由馬頭岡開闢，下至蒜口，相傳唐武德開闢。這雖是秦漢時桂陽的舊路，經由道路者，可避免昌樂道內的難處，也可以進福州。但唐人走道路的好手很少。

（註六五）據曲江集（卷十一）開元大興道路序。徐浩文獻公碑也說：「始與北嶺，喻以峻絕，大興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請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

（註六六）元和郡縣志（卷一京兆府藍田縣）：「舊本：東南自商州上洛縣界流入，又西北流合潏水入渭。」由藍田至商洛是當時來往通陽的要道。曲江集（卷三）有自藍田至山南行，商洛山行懷古及南陽道中作三首詩，大抵是赴荊州時作。昌黎全集（卷一）赴江陵途中寄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等說：「商山季冬月，冰凍結行時。」是貞元末赴荊州時作。同書（卷十）左遷至藍田承應縣制說：「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橫藍田馬不前。」這是元和十四年制荊州時作。韓愈兩次到藍田去，都是走這條路。

（註六七）昌黎全集（卷十三）亦見文苑英華卷八二六。韓愈亭記說：「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商山，

臨溪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峴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無梯險嶺。接款所象，魚鼈所宮，極幽遠瑰麗之觀，宜其於山水既開而厭見也。」王弘中由長安至連州所經的道路與今所考的路線完全符合。文苑英華（卷七二五）于邵從叔南遊序說：「既而將登南嶺，羣鷄季梨樹之顯時，進浮沱浪，追漁父遺代之始終。或經九疑，或入五嶺，探靈感，廣異聞。」也和這路線相合。

（註六八）曲江集有經江寧府至玄武湖，當塗界寄裴宣州，江上使風呈裴宣州，由烏程章初途次廬山東巖下，入廬山仰望瀑布水，彭蠡湖上等詩，大抵開元十五年出守洪州時道中所作。宋之問集有寒食江州贈柳愚，自洪府舟行直達其家等詩，是神龍元年貶瀘州道中作。李文公集（卷十八）題柳愚亭說：「與監察御史韋君諤曾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縣以正月十八日舟子禮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於泮宋之郊；或不及，約自宣城會我於常州以偕行。既而停宿留，日以須。韋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談笑到，適江南流上。船以妻疾居僧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韋君亦前行矣。」元和四年李綱韋嗣立繼南節度使楊於陵的辭召赴廣州：李綱沿着遺運的水道走，韋嗣立由陸路走。但他到了宣城後，立即溯流至江州，再下洪州，所以不能和李綱會面。（宋之問：洪府舟行直達其家說：「仲春辭國門，長途橫萬里，越淮梁楚障，造江沔吳淞。」疑與韋嗣立路線相同。）

(註六九)據李翱來南錄(李文公集卷十八)所說：由東都沿洛道，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以後經河陰、汴州、陳留、雍邱、宋州、永城、埇口、泗州、轉進上河如揚州，下汴梁入淮，經盱眙、新浦至楚州及揚州。濟大江至潤州、經常州、壽州、松江、杭州、富春、睦州至衢州。自常州上船至玉山，經信州、波石湖至洪州。經吉州、虔州，上大庾嶺至贛昌。過贛石及贛山至韶州，再過贛陽峽清遠峽至廣州。

(註七〇)李翱來南錄說：『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僑府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進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邵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濤，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萬嶺。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尋江。自大庾嶺至贛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贛昌至贛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贛昌，出韶州而之西江。』

(註七一)宋之問集有偃大庾嶺北驛，早發大庾嶺，度大庾嶺等三首。此外又有早發始興江口至盧氏村作，遊韶州廣界寺，早發韶州，早入清遠峽，宿清遠峽山寺，登陽王臺，廣州朱長史參政妓，發端州初入西江，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四(五)朝隱

唐代的韶州

，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感詠入韶州江等詩首，都是這次貶途中所作。但自衡陽至韶州謁能靜師一首，疑是舊作；在嶺南學報四卷二期拙作題能靜師詩實錄另有詳細的考證。

(註七二)全唐詩(卷三)杜審言詩裏面有渡湘江一首，沈佺期集中有神龍初歲遊南荒途出榔口北望嶺山一首。又有遙同杜員外寄宣慰使說：『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羣？』可見兩人同是取道衡湖。神龍二年六月承恩北歸(峽山寺題并序)所作的詩，有自昌樂郡泝流至白石嶺下行入榔州一首說：『泝舟始與隍，登陸桂陽郡。』則北歸時亦由此路。

(註七三)據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卷二)長慶四年二月貶李紳爲端州司馬。舊唐書(卷一七三)本傳也說：敬宗初即位，爲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李紳追省(卷上)有過荊門，涉沅湘，過嶺輒止荒險極高要等三首。最後一首說過嶺時的情形很詳。

(註七四)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赴臨皇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切諫。憲宗大怒，乃貶爲潮州刺史(事詳新唐書韓愈傳)。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說：『作書詆佛獻君王，要覲南海觀衡湘。歷舉九疑弔英皇，詔慰先驅瘴者藏。』昌黎先生全集裏面有謁衡嶺廟遂宿嶺寺題門樓(卷三)湘中，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榔口又題(二首)郴州新閣(卷九)等詩都是在湘中作；題臨嶺寺，晚次宜溪尋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首)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問程，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

留別銀端公使君（卷十）等詩都是入了泗州境界後所作。而溫吏（卷六）一詩尤有名。同書（卷十三）新修滕王閣記說：「十四年以官事斥守揚州。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還南昌，而親所留滕王閣者。」大概衡湘一路線比豫章一路線為近，所以轉愈為著要道，未能到滕王閣遊玩，在他自己也認為「憾事」。

（註七五）唐書李德裕傳說：「宣宗即位，遷相出為東都留守。大中元年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新舊本傳：元年貶潮州司馬之下，刪去潮州司戶一節。」

（註七六）新舊唐書地理志都說：泗州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

（註七七）通鑑（卷二二五）天寶五載七月丙辰禁流貶人在路還留說：「自今已後，其左降官是情狀稍重者，日聽十驛已上赴任。」亦見全唐文卷三十二。又大和五年御史奏：「應諸州刺史謝官後限發赴任日之准勅例：刺史謝官後，不許遲延限十日內發。伏以刺史治民之官，受命后同宜速行，或以道途稍遠，私室貧乏，限內不能辦集事宜。今請量其遠近次第限日：應去京一千里內者限十日，二千里內限十五日，三千里內限二十日，三千里以外者限二十五日。……更有此事遲留，更加懲責。其貶授刺史，即請准舊例發遣，不依此限。」

（註七八）例如李商隱送李使君歸州說：「獨過長沙去，難堪此路愁？」重推後却赴外特遣止寄元郎中說：「空令數行

淚，來往落湘沅。」却赴南昌留別蔡臺知已說：「援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文苑英華（卷二七）賈至送岑參赴虜州說：「聞道衡陽外，由來雁不飛。」送陸協律端州說：「越井人難去，湘川水北流。」同書（卷七二五）于邵送鏡上人遊羅浮山序說：「前年曾自道湘登桂嶺。」送陳秀才傳說：「故不遠數千里，游瀟湘，踏零桂，而寄來上調府公。」元氏長慶集和樂天送客遊嶺南說：「江館連沙市，酒船泊水濱。蔚田迴北顧，銅柱指南隣。」其他詩文例證，不勝枚舉。

（註七九）宋之問李德裕的貶嶺南，都是由東都動身的。續元和郡縣志（卷三十四）泗州西北至東都取樞州路三千四百二十五里，取虔州吉州路二千八百七十里。假如這個數目不錯的話，大庾一路線比較樂昌路線還近些。但新舊唐書地理志都說：「泗州至東都四千一百四十二里。」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九）說：「泗州西北至西京（宋時的西京是洛陽，即唐時的東都。）取樞州路四千一百四十二里，東北至東京（即唐時的汴州）二千九百四十里。」大抵宋時至汴京取吉州虔州路，到洛陽取樞州路。元和郡縣志所言里數，與其他地理書均不符，未敢置信。

（註八〇）例如李翺草詞應淮南節度使楊於陵的辟召，似為友誼的幫忙，自然稍假以時日，從容不迫，所以可以繞道江浙而入江西。又如高宗上元二年王勃的往交趾省父（詳新舊唐書王勃傳）道過南昌，得參與滕王閣的盛會，大抵亦取吉州虔州路。這是個人的行動，

可以自由的。

(註八一)見余靖武溪集及曲江縣志(卷八與地書六)。

(註八二)據宋史食貨志：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明州、杭州、泉州置司。同書高宗本紀：「建炎三年三月癸巳，設浚儀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置海舶。」

(註八三)明郎潛遺集會稿(卷十三)野花亭記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於羊城。由是溯潯溪，喻原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越宋衛之境，以達燕京。」同書(卷十五)跋古寶像後說：「羊城黃氏子英，越原嶺而北，沿章江下大江，浮淮泗，經齊魯之域，直抵京師，或東北至遼海之地。」明清兩代南北交通的路線大概如是。

(註八四)廣東在唐以前的人物如漢時的楊孚、羅威、董正、唐順等(廣東通志卷二六八及廣州人物傳卷一)雖可算是鄉賢，但功業尚未顯著。若三國時的黃蓋(廣東通志卷二六八)陳時的侯安都(李渤司空侯安都碑)隋末唐初的鄭文進(廣州人物傳卷三)皆以平功勳，但道行文章不足以照耀千古。

(註八五)唐及北宋中國海道的南北交通尚未發達，大家都走陸路，潮州自然是最重要的樞紐。所以唐的皇甫湜、陽休之、宋余靖的湑水館記都說潮州是嶺南的大郡。大抵唐代是潮州的「黃金時代」，北宋是潮州的「白銀時代」。當時嶺南文化的中心可說是在潮州。然曲江、江蘇氏自仲方以後，似乎沒有什麼聞人。到了五代的時候中原多故，

民族南遷者頗多(五代史劉隱傳)無異給潮州來了一幫生力軍，所以到了北宋，便有余靖的崛起，這是潮州的復興時期。南宋以後中原的民族似乎沒有大批的向嶺南遷徙了，祇有潮州的黎族向廣州南遷罷了。

(註八六)據宋會稿(卷三)廣州府志書序說：「今則絳韻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班班然盛矣。北學於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遠以潛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國漸反為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漸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歟？」同書(卷十)南海縣儒學記說：「南海在前代者潮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現山縣學記說：「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重建疏山縣治記說：「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遺外視之。靜其文俗尚則曰：海邊鄉俗；誇其物質則至目以小蘇杭焉。」由這幾段話可見廣東的文化在明代已趕上北方，大有可觀了。大概自南宋以後，北方淪於異族，中國的文化中心已經移到東南，文物也以江南、嶺南為最盛。據說明清兩代科第之盛首推三江，次為兩廣。海禁大通以後，廣東得西化之先，為革命的策源地。自成化維新辛亥革命以來，廣東人材輩出，為黨國的元勳，似乎足與江浙並駕齊驅了。

購

日 廿 六 年 六 月

唐代的廣州

(註八七)自南宋以後，海道交通日漸發達。廣州為一大都會，也是嶺南的政治中心；而地濱南海，中外通商，海舶往來，絡繹不絕又為經濟的中心。原日住在閩州的衣冠望族也不免因政治或經濟的關係，逐漸向廣州遷徙了。所以廣州的文化愈趨直道，超過閩州之上。說到人物：如南宋的范仲淹之李昉等，明代的陳獻章湛甘泉等，或以功業顯，或以思想著，都是廣州府屬的人，而廣州反視為無關。甚至蘇軾海外的項鼎，在明代的時侯也能產生如邱濬馮瑞等偉大人物。可見中國文化的南移，已經成了自然的趨勢。就以廣東一省而論，文化的發展也是由北而南的。(我妻會稜(卷十)史籍學記說：『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皆稱曲江，在今世則無東莞者。』東莞是廣州的屬縣，可見曲江自明代以來，人物已無足數了。這雖是五嶺海外，然海外的貿易也不弱。而且唐宋間代大批的政治犯流徙到海南的疋島去。如唐的敬暉，李邕，章執李德裕等；北宋的韓琦，南宋的趙鼎等都是彰明較著的人物。經了六七百年的風雨，文化已稍有可觀了，正如邱濬所說：『然而今日衣冠望族之盛，無以異中州；其盛衰替，亦或有過之。』所以瓊崖在明代的能夠產生三個著名的人物，也是理所當然的。)

國際貿易導報

第七卷 第六期 目錄

- 民國二十三年第三季第四季貿易報告——附全年貿易報告(續)……何炳生
美國經濟考察團與中美經濟關係……許之
最近世界經濟之發展與方法(續完)……林
察哈爾的物產與商業……武
新疆的物產與商業……武
陝西省棉花分級與棉業調查報告……朱
日加貿易的最近發展……朱
最近國外需要之國產品……朱
國際貿易統計——二十四年三、四月份
國際統計——二十四年四月份
國內外貿易消息……朱

站在國民立場的

中國日報

內容豐富 銷路廣大

副刊有隨園、中天、挺進、國際述評、婦女家庭、國術體育與軍事、史地專刊、科學週刊、經濟週刊、圖畫週刊。

報費——每月六角，郵費一角五分。

社址：南京明瓦廊五十五號
電話：二二六九五

